

北非研究

试论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党制度^{*}

李竞强

摘要：2011年初以来，突尼斯开始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政党在推动突尼斯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数年的演变，突尼斯的政党制度从碎片化向制度化转变，但制度化进程尚未完成。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党制度提供了政治参与的途径，建立了新的宪政制度，形成了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理性竞争机制，提高了突尼斯政治现代化的程度。转型时期突尼斯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制度发展。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在中东剧变之后有了长足发展，逐渐建立起了现代政党制度。然而，由于突尼斯的政治稳定与政党制度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其政党制度发展的不充分导致民主巩固的前景并不明朗。

关键词：突尼斯；政党；政治参与；民主转型

作者简介：李竞强，博士，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郑州大学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洛阳 491324）。

文章编号：1673-5161(2018)05-0105-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第6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突尼斯民生问题研究”（2017M612408）的阶段性成果。

政党是指通过选举或其他途径来赢得政府权力和实现政治利益而组建起来的政治组织。^① 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运作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美国政治学家戴维·阿普特提出了政党的三大特点:第一,政党的主要功能是组织公共舆论、汇集民意,并将民意传递给政府官员和领导者;第二,政党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组织,可以自行产生权力;第三,政党作为干涉变量、依赖变量和独立变量,影响国家内部的政治形势。^②

突尼斯最早的政党成立于 20 世纪初,是突尼斯政治进入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1908 年,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建了青年突尼斯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国际形势的影响,突尼斯首个代表城乡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政党自由宪政党于 1920 年成立。1934 年,自由宪政党发生分裂,以哈比卜·布尔吉巴为代表的激进派另组新宪政党。新宪政党通过动员底层民众参与政治,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民族主义政党的出现,使得 20 世纪上半叶突尼斯政治被打上了深刻的民族主义烙印。

1956 年,突尼斯在新宪政党的带领下实现独立,该党由此成为执政党,突尼斯以此为基础逐渐建立起现代政党制度。突尼斯独立之后,新宪政党接管了政权,政党和国家机器合二为一。^③ 1964 年,突尼斯全力推进社会主义运动期间,新宪政党更名为社会主义宪政党。1987 年突尼斯政治危机爆发后,政治强人本·阿里将其改组为宪政民主联盟,一直持续到 2011 年。1956~2010 年,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在发挥动员、组织作用的同时,也经历了一些调整。从大的方面而言,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在威权主义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经历了变革。有学者指出,突尼斯旧威权主义政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中,通过经济自由化、政策转变、组建统治联盟及重构政治合法性等手段实现了对政党制度的调整。这种调整主要表现为本·阿里政变之后将政党制度从一党制改造为一党主导的多党制,执政党的功能从组织动员向维持效忠转变,这些转变的结果是新威权主义政权不仅维系了统治,而且重新焕发出活力。^④

但是,威权主义政治最终并没有解决政治参与制度化的问题,一党制主导的突尼斯政治民主化实践逐渐趋于保守,最终被民众所抛弃。2010 年底,突尼斯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导致本·阿里政权被推翻,突尼斯政治现代化进入新的转型时期。

谋求政治稳定是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府的主要任务。经过数年的发展,突尼斯初步实现了民主转型,正向民主巩固阶段迈进。突尼斯在转型时期基本上摆脱了

① [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 年版,第 137 页。

② 同上,第 137-138 页。

③ Lars Rudebeck, *Party and People: A Case Study of Political Change in Tunisia*, London: C. Hurst & Company, 1967, Preface.

④ Stephen J. King,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89.

内战、军事政变和威权主义政治,政党政治无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归纳中东变局以来突尼斯政党制度演变历程,探析政党政治对民主转型的积极影响及不足。

一、中东变局以来突尼斯政党的演变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党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宗派期、两极化、扩展期和制度化四个阶段。^①在宗派期,选民、政治名流或立法机关中的部分人与其追随者组成了政党。在两极化阶段,政党之间为了竞争必须进行相互联合,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较强大的政党在竞争过程中往往会经历力量的扩展,向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转变。当重大危机或社会变迁发生后,政党体制随之发生变化,固定为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②突尼斯剧变之前,一党制和一党主导的政党制度限制了政党的发展。在民主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党在原有基础上迎来了迅猛发展的良机。突尼斯政党制度发展的过程也体现了类似的宗派化政党,两极化趋势,以及政党的扩展。但突尼斯政党的制度化则既非议会政治发展的结果,也不是革命的后果,而是在现实政治中分化组合的结果。有学者指出,自2011年突尼斯开启民主转型以来,突尼斯政党政治主要经历了碎片化阶段和制度化阶段。^③

(一) 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党政治的主要发展阶段

1. 碎片化阶段(2011年1月至2011年10月)

2010年底爆发的突尼斯剧变推翻了本·阿里政权,废除了一党主导的多党制度。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流亡沙特阿拉伯,标志着突尼斯威权主义政权的崩溃。以突尼斯总理穆罕默德·加努希为首的民主宪政联盟试图挽救局势,但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加努希被迫放权。突尼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政治权力展开了激烈竞争,该国政党政治格局逐渐步入了碎片化阶段。

2011年3月9日,宪政民主联盟被解散,标志着突尼斯政党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本·阿里时期,反对党的政治空间被严重挤压,其活动受到突尼斯政府的严密控制。进入转型时期后的突尼斯开放了组建政治团体的自由,在争取革命成果高级委员会的主导下,突尼斯国内先后成立了150个政党,5,000余个协会。同年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44页。

^② 同上,第344-349页。

^③ Andrea G. Brody-Barre,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alition Building on Tunisia's Democratic Future,"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8, No. 2, 2013, pp. 221-226.

10月23日,在突尼斯制宪议会选举阶段,全国涌现出了81个合法政党。^①从政党图谱的分布来看,从极左翼政党到极右翼政党的各种政党林立,左翼政党如突尼斯共产党、民族主义世俗政党,右翼政党包括复兴运动、萨拉菲运动党等,还出现了伊斯兰之声等极右翼政党。^②事实上,这些政党中很多只是代表特定团体利益的宗派政党。左翼政党主要有突尼斯劳工党(Tunisian Labor Party)、社会主义民主运动(Socialist Democratic Movement)、社会民主正义党(Party for Social Democrat Justice)、爱国民主党(Patriotic Democrats 或 *Watad*)、社会主义左翼党(Socialist Left Party)和突尼斯工人共产党(Tunisian Workers Communist Party);中左政党主要有劳工自由民主联盟(Democratic Forum for Labour and Liberties 或 *Ettakatol*)、共和大会党(Congress for the Republic)、民主进步党(Progressive Democratic Party)、现代民主之极(Modernist Democratic Pole);中间党派主要有家园党(Homeland Party 或 *El Watan*)、光荣党(Glory Party 或 *Al Majd*)、人民共和联盟(Popular Republican Union)和创新党(Initiative Party 或 *Al Moubadara*);中右政党主要有复兴运动(Renaissance Party 或 *An-Nahda*)、独立民主联盟(Independent Democratic Alliance)、爱国自由联盟(Free Patriotic Union)和突尼斯希望(Afek Tounes);右翼政党主要有马格里布自由党(Liberal Maghrebine Party);民族主义政党主要有人民统一党(Popular Unity Party)和再生党(Regeneration Party 或 *Al Baath*)。^③从表面上看,该时期突尼斯的政党政治蓬勃发展,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得到了充分释放。然而,各政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力量尚未受到选举的考验,因此呈现出无序化发展的局面。

不过,在这一时期,被大家广为关注的还是复兴运动与共和大会党的发展。复兴运动在长期与政府对抗的过程中建立了庞大的联系网络,并在突尼斯剧变后派上了用场。共和大会党虽然规模不大,但因为有知名领袖马尔祖克(Mohsen Marzouk)的领导,也受到普遍欢迎。因此,突尼斯政党在表面上无序发展的同时,也表现出“两极化”的特征。但是,由于许多有政治抱负的活动家从一些大的政党分离出去,自行建党,传统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政党,如突尼斯民主进步党等发展相当有限。

2. 制度化阶段(2011年10月至今)

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举行制宪议会选举,标志着突尼斯政党政治发展进入了制度化阶段。首次选举后共有19个政党通过此次选举进入了突尼斯议会。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以37%的得票率获得了41%的议会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共

^① Sam Bollier, "Who Are Tunisia's Political Parties?," *Al Jazeera*, October 27, 2011, <http://english.aljazeera.net/indepth/features/2011/10/201110614579390256.html>, 登录时间:2018年2月4日。

^② "Tunisia's Political Parties," *Guardian*, October 19, 2011, http://image.guardian.co.uk/sys-files/Guardian/documents/2011/10/19/Tunisian_Parties_2010.pdf, 登录时间:2018年2月8日。

^③ Ibid.

和大会党、民主进步党、劳工自由民主联盟以较大差距位列其后。制宪议会同时担负制定突尼斯新宪法和过渡时期国家治理的责任,这为突尼斯政党政治走向制度化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各政党在议会中有权就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规划表达自己的意见,完善了该时期突尼斯议会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执政党则可以凭借选举产生的政治合法性推行本党政治纲领,以此引领突尼斯的政治转型。

另外,突尼斯政党围绕摒弃极端主义和暴力行为达成了共识。由于北非地区萨拉菲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2013年8月,突尼斯议会艰难通过了取缔萨拉菲派政党组织的决议。政府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取缔激进伊斯兰政党和保留温和伊斯兰政党的态度,使得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延续了世俗政治的特征,突尼斯主要政党采取了温和、中间立场。2014年大选后,突尼斯政党的制度化进一步提升。复兴运动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主动致电当选总统的突尼斯呼声党主席埃塞卜西(Béji Caïd Essebsi)承认败选,并向对手表示祝贺。^①

(二) 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党政治的主要特点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扩大的方式会影响到随后将要发展起来的政党体制”^②。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的形成往往源于民族主义运动,存在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三种模式。1956年突尼斯独立后,一党制的政党制度逐渐形成,且制度化程度较高。在经历2011年的政治变革后,突尼斯的政党制度逐渐转向多党制。但是,与20世纪后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③不同,2011年以来突尼斯的政治转型属于新型的政治变革范畴,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转型时期各政党对新的政治环境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适应能力。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一枝独秀,很快以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成为转型时期突尼斯第一大党,在“突尼斯革命”后的两次选举中先后获得了37%和26%的得票率。共和大会党、争取民主自由联盟、社会民主运动以及突尼斯共产党凭借其历史影响力和民众基础,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议会席位。新成立的政党“人民请愿党”(Popular Petition)因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魅力型政党领导人,也在突尼斯政坛获得了一定影响力。而人民统一党、社会民主自由运动和民主工会联盟等政党因未能及时调整政治策略,难以适应变化中的政治环境,最终被选民所遗弃。事实上,很多政党在

^① Antoine Lambroschini and Bel Aiba, “Islamist Party Congratulates Rival for Tunisia Vote Win,” *Yahoo*, October 27, 2014, <https://www.yahoo.com/news/tunisia-islamists-congratulate-secular-rivals-vote-win-185743723.html>, 登录时间:2018年8月20日。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49页。

^③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指的是1974年之后,首先发端于葡萄牙、西班牙,后来囊括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南欧国家的广泛的自由主义民主化运动。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0页。

本·阿里时期就已存在,但当时由于受到政权压制难以有效发挥反对党的作用,且在转型时期提出的政治纲领没有充分回应民众的诉求,因而在转型时期影响力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第二,转型时期新建政党的包容性更强。通过两次选举,温和派政党在突尼斯议会中获得了更多席位,导致极端派政党逐渐失去了议会席位。以复兴运动、人民请愿党为代表的温和伊斯兰政党,和以共和大会党、突尼斯呼声党为代表的温和世俗政党,都能包容其他不同类型的政党。而作为极右翼势力代表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Ansar al-Sharia)因被突尼斯政府列为恐怖组织,导致激进伊斯兰势力影响力大幅受挫。同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突尼斯中左政党和中右政党成功实现了联合执政。在制宪议会统治时期,复兴运动同共和大会党、争取民主自由联盟三党组建了联合政府。复兴运动展现出的政治妥协与合作意识受到了各界的一致称赞。2014年12月大选后,此前坚决反对复兴运动的突尼斯呼声党也接受了复兴运动组建联合政府的事实,建立了新的联合政府。虽然突尼斯呼声党内部对此事产生了激烈争论,但该党大部分党员最终接受了这一政治安排。可以说,对于突尼斯在转型时期面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难题,各政治党派能够以政治妥协和联合执政的方式来共同应对危机,推动了突尼斯政党制度的发展。

第三,两党制隐现,政党区分度加强。转型时期,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迅速崛起,世俗政党也经过分化组合成长起来,与其分庭抗礼。在转型初期,世俗政党相互拆台与攻击,缺乏引领民主化的政治意识。复兴运动的上台执政,激发了世俗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意识。世俗政党在与复兴运动争夺统治权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原先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开始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发展。多数政党认识到,无论是世俗政党,还是宗教政党,其施政纲领都必须回应民众对迫切改善民生的诉求。2012年7月6日,由埃塞卜西牵头成立的世俗政党突尼斯呼声党成功推动了反对党之间的联合,包括宪政民主联盟成员在内的世俗派反对党人士都加入了该党。同年10月7日,不满埃塞卜西的左翼政党在哈马·哈马米(Hamma Hamami)的领导下联合组建了“人民阵线”,该联盟以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为旗帜,先后吸纳了12个世俗政党。此外,进步民主党、突尼斯希望党和共和党(Joumhour)也实现了联合。^①

突尼斯经过两次选举后,以中右政党复兴运动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和以中左政党突尼斯呼声党为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在突尼斯政坛脱颖而出,两党在议会大选和总统选举中都有不俗的表现。作为突尼斯政治剧变产物的复兴运动首屈一指,执突尼斯政治之牛耳。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曾担忧突尼斯是否会进入由

^① Lise Storm, *Party Politics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North Africa*,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4, p. 122.

伊斯兰力量主导的神权政治时代。复兴运动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明确承诺突尼斯将坚持民主的表态打消了西方国家的疑虑。^①复兴运动在加努希的带领下通过参与民主选举和同世俗政党组建联合政府,确定了该党在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坛的地位,使突尼斯避免再次滑向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政党之间的妥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复兴运动同共和大会党和争取民主劳动联盟两大世俗政党联合执政,被视作“后革命”时期突尼斯的独特经验。^②作为突尼斯第一大党的复兴运动,在突尼斯新宪法制定期间切实回应了民众关切,最终伊斯兰教法没有被确定为宪法的法源,叛教行为没有入刑,妇女地位得到了保障,突尼斯共和国建立初期通过的《个人地位法》得到保留。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务实合作,提高了突尼斯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复兴运动也以温和伊斯兰政党的形象和务实政策,赢得了突尼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肯定。2014年10月,在突尼斯新宪法制定后的第一次议会大选,突尼斯呼声党获胜,以86个议席超越复兴运动的69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③目前,突尼斯已经形成了突尼斯呼声党和复兴运动共同主导的局面。

第四,突尼斯政党政治向政策型政党发展。转型时期,复兴运动、突尼斯呼声党、共和大会党、民主进步党都经历了由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转变的过程。不同于其他草根色彩浓厚的政党,这些在议会获得席位的政党的专业化程度更高。在本·阿里时期,突尼斯反对党主要以获得议会席位为其短期目标,功利色彩比较浓厚,但这一策略在转型时期已经难以奏效。政党的成功取决于选民的支持率,因而能否制定出满足选民期望的政策是评判政党成功的重要标准。在转型时期的突尼斯,各主要政党日益重视民众的关切,能否回应民众诉求成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复兴运动虽然是伊斯兰政党,但出于提高民众支持率和联合世俗精英力量的现实考量,拥护民主,而且极力推动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兼容。2016年5月,复兴运动召开全国大会,正式放弃了政治伊斯兰纲领,采用“穆斯林民主”的新理念。^④这表明复兴运动针对突尼斯的具体国情,在吸取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倒台的教训后,完成了向“政策型”政党的转变,突尼斯呼声党则通过攻击联合政府在提振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全方面政策

^① Monica Marks, “Convince, Coerce, or Compromise? Ennahda’s Approach to Tunisia’s Constitu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February 10, 2014,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onvince-coerce-or-compromise-ennahdas-approach-to-tunisia-constitution/>, 登录时间:2018年8月20日。

^② Eva Bellin, “Drivers of Democracy: Lessons from Tunisia,” *Middle East Brief*, Crow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 of Brandeis University, No. 75, August 2013, p. 3.

^③ “Tunisia Results Confirm Nidaa Tounes Win,” *Al Jazeera*, October 30, 2014,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middleeast/2014/10/tunisia-results-confirm-nidaa-tounes-win-201410302242399953.html>, 登录时间:2018年8月20日。

^④ Anne Wolf, *Political Islam in Tunisia: The History of Ennahda*, London: C. Hurst Publishers, 2017, p. 160.

不力,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其选举口号聚焦于改善国家治理和恢复突尼斯繁荣。突尼斯共产党、民主进步运动等政党,也都表现出了类似的特点。

二、政党政治对突尼斯民主转型的积极影响

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政党政治是民主转型的核心。突尼斯在本·阿里政权倒台后进入民主转型阶段,政党的分化组合及其制度化进程,既是威权政治垮台后民主转型的产物,也是影响民主转型进程和民主政治运转的主要因素。不论是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还是世俗政党突尼斯呼声党,都在政治转型时期实现了迅速发展。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实力往往体现在组织和动员两个层面,组织能力旨在使政党成员团结在既定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之下,动员能力则是实现各项目标的前提条件。如果转型国家的政党制度发展程度低,社会中的其他政治力量则可能填补权力真空。政党政治对突尼斯民主转型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机制、制度、动力等方面。

第一,政党制度为突尼斯的民主转型提供了基本的运行机制。转型时期的政党为选举目的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纲领。新的政治现实增强了政党的凝聚力,各政党充分发挥其组织和动员能力,参与竞选活动,民主政治逐渐成为转型时期政治力量的活动舞台和运作机制。不论复兴运动、民主进步党、共和大会党,还是突尼斯呼声党,都为追求选举成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政党建设。无论是伊斯兰政党和世俗政党之间的分歧,还是各世俗政党之间的争论,最终都能够通过政党政治实现妥协。2013 年突尼斯政治危机发生后,市民团体组成的调解组织对各种力量之间的分歧进行成功调停,就与突尼斯政党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突尼斯政党接受并坚持民主规则,保证了民主政治的运转。

第二,政党制度的发展为宪政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保障。2011 年以来,突尼斯之所以能够实现从威权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与其宪政制度的重新确立密切相关。政权更迭后的突尼斯并没有效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做法,而是谨慎地对本国宪政制度进行重构。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彻底推翻了旧体制,使得本·阿里旧部被排除在过渡政府之外。本·阿里时期的二号人物、宪政民主联盟秘书长穆罕默德·加努希曾试图领导过渡政府,使突尼斯政治变革实现“软着陆”,但以失败告终。曾在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时期担任过部长的资深政治家埃塞卜西希重回政治舞台后,突尼斯政局逐渐趋稳。制宪议会选举之后,主导政府和议会的复兴运动曾希望按照自己的政纲实现突尼斯的政治转型。但因遭到突尼斯世俗力量的强烈反对,复兴运动最终在政治上选择了妥协,从而建立起了包容性更强的政治制度。其一,复

兴运动主导的政府将伊斯兰教定为突尼斯的国教,但并没有确立伊斯兰教法为法律来源,维持了突尼斯的世俗政体。其二,复兴运动放弃了原先将叛教列入宪法条文的努力,最终接受了信仰自由的条款。其三,复兴运动尊重民众自独立以来达成的平等共识,妇女仍然是平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男性的附属。其四,复兴运动和世俗政党经过多次激烈争论后,双方接受了半总统制的政治体制,既保证了复兴运动在议会中保持长期影响力的可能,又满足了世俗政党对建立强有力行政机构的诉求。^①经过两年多艰难的制宪历程,突尼斯最终制定了为各方所接受的宪法,政党在制宪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政党制度的发展使突尼斯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趋于理性,政治民主化程度显著增强。突尼斯的政治转型始终以低暴力的形式向前推进。获得合法地位的政党在表达政治诉求时,大多采取游行、示威、媒体战等途径,而非诉诸于暴力。突尼斯转型时期出现的政治暴力,基本上是被排除在主流政党之外的极端分子所为,如萨拉菲运动曾袭击过突尼斯文化中心、世俗电台和酒吧。^②另外,突尼斯政治精英追求个人政治抱负基本上是以政党为依托,而不是依靠军队。马尔祖基、埃塞卜西、贾法尔(Mustapha Ben Jafar)、哈姆迪(Hachmi Hamdi)等人都有担任突尼斯总统的愿望^③,但他们实现政治目标的方式无一例外都选择依靠各自隶属的政党,相互之间的竞争更为理性。尤为重要的是,通过选举的考验,各政党越来越关注突尼斯普通民众的基本诉求,不再坚持原有的政治纲领。复兴运动抛弃了实现伊斯兰主义政治的目标,选择与世俗政党开展合作进行联合执政。世俗政党也改变了过去坚决反对伊斯兰政党的主张,逐渐包容伊斯兰主义思想。共和大会党前主席马尔祖基曾公开表示支持妇女戴遮挡面部的头巾。在竞选环节,各政党提出的纲领重点逐渐聚焦具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议题,而不是围绕教俗关系泛泛而谈。

政党政治的有序发展使得民主政治氛围逐渐在突尼斯社会形成,取代了过去威权政权的政治文化,确保了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突尼斯政治精英和民众都开始接受通过民主政治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以选举的方式实现权力调整。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政治家的地位来自于选举的成功。因此,政党政治的发展促进了突尼斯的民主转型。

^① Justin O. Frosini and Francesco Biagi, eds.,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n North Africa: Actors and Fact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19-23.

^② Stefano M. Torelli, Fabio Merone, Francesco Cavatorta, "Salafism in Tunisi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mocratiz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9, No. 4, Winter 2012, p. 148.

^③ Anne Wolf, "Can Secular Parties Lead the New Tuni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30, 2014,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4/04/30/can-secular-parties-lead-new-tunisia-pub-55439>, 登录时间:2017年12月1日。

三、突尼斯政治转型时期政党制度的现实困境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突尼斯较其他经历剧变的阿拉伯国家相对顺利地完成了政治转型。与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不同,突尼斯政治转型过程相对平稳。虽然近几年突尼斯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且对突尼斯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安全压力,但总体上并没有扰乱突尼斯的政治秩序。转型时期的突尼斯基本实现了政治稳定,维持了政治秩序的动态平衡。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突尼斯政党制度仍然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尚不能完全发挥政治参与机制的作用。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相互作用是政治稳定的主要机理。在政治转型时期,突尼斯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迅速上升,对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带来了很大压力。突尼斯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各种协会表达自己诉求。“革命成果保护联盟”、“民族拯救阵线”、“民主妇女协会”等新成立的政治团体,以及“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雇主协会”、“突尼斯律师协会”、“突尼斯人权联盟”等传统社会组织在推动民众表达自身诉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通过参与各个政党表达利益诉求。不论是原有的反对党,还是新组建的政党,都能够起到代表一定数量选民的作用。总的来看,复兴运动、突尼斯呼声党、民主进步党等中间党派的代表性最强,极左翼和极右翼的党派代表性则比较差;萨拉菲运动等激进政党因缺乏合法性而难以施加影响力;突尼斯共产党仍在争取获得议会席位,但受到具有工会背景的政党冲击。三是新闻媒体的诉求表达。突尼斯在政治转型时期的最大成就是新闻自由,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反对党的作用。^① 伊斯兰政党上台执政后,新闻媒体对伊斯兰主义在突尼斯的兴起进行了批评和攻击。如 2012 年媒体曝光的一个视频显示,2011 年复兴运动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支持激进的萨拉菲运动,呼吁参与该运动的年轻人耐心等待“伊斯兰社会”的建立。^②

由此可见,政党只是实现政治参与的途径之一,而且不能完全取代其他方式。突尼斯政党对政治参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意识形态迥异的政党之间的政治妥协,使得突尼斯民众的各种呼声能够得到反映,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都得到了体现。另一方面,突尼斯最终确立的半总统制国家体制有利于小型政党的存在,而且能保证小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权受到其他政治势力的重视。历史经

^① Anne Wolf, "Can Secular Parties Lead the New Tunisia?".

^② Anne Wolf, *Political Islam in Tunisia: The History of Ennahda*, p. 151.

验表明,议会制更有利于民主转型的实现。^① 议会制度由选民选举产生,为政权提供了合法性。议会是权力的中心,行政权力从属于议会,内阁由议会产生并接受议会的质询和监督。大多数小国选择了议会制度。转型时期的突尼斯政党政治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政党活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突尼斯政党可以自由制定其纲领,公开动员群众参与政治,举行竞选集会,表达政治观点。由于宪法对集会自由的保障,各政党还可以发展下属组织,发挥政府与社会团体、民众沟通中介的作用,这为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奠定了政治基础。但是,政党之外的市民社会组织,如突尼斯总工会,以及媒体的作用也不容低估。2013年突尼斯政治危机发生之后,社会组织发挥了协调作用,挽救了民主转型进程,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第二,突尼斯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发展成熟或趋于稳定的标志是“主要政党成为可以预测的行为体,它们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尊重内部和外部组织程序,尊重选举结果”^②。在转型时期,突尼斯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议会制度和司法体系。各政党对于选举结果的接受,以及以选举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进一步增强了突尼斯政党的制度化。观察家对突尼斯成功举行的两次大选都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选举基本上达到了公平、公正的标准。^③ 选举之后,各个政党和政治领导人都接受了选举结果。选举已经成为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不论是传统政党,还是新建政党都在努力适应这种制度。

但是,转型时期突尼斯政党政治的制度化仍然是一种弱制度化。一方面,政党的碎片化程度仍然很高,政党的分化组合尚未结束。突尼斯的威权主义政体解体之后,政党政治的碎片化程度很高。人口只有一千多万的突尼斯却拥有上百个政党,让选民无所适从。经过两次选举,突尼斯政党的数目虽然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完全固定下来。而且,政党体系越是碎片化,政党的力量越容易受到社会势力的控制,不利于民主转型。^④ 主要政党如突尼斯呼声党和复兴运动虽然已经脱颖而出,但其内部问题丛生,并不稳定。2016年,突尼斯呼声党22名议员退党,小埃塞卜西(Hafedh Caid Essebsi)^⑤和秘书长马尔祖基之间形成了对峙。^⑥ 该党之所以能够保持统一,主

① 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② Andrea G. Brody-Barre,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alition Building on Tunisia’s Democratic Future,”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8, No. 2, 2013, p. 222.

③ “Final Report: Legislative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unisia: Final Report — October, November, and December 2014,” *The Carter Center*, p. 12, https://www.cartercenter.org/resources/pdfs/news/peace_publications/election_reports/tunisia-final-rpt-2014-elections.pdf, 登录时间:2018年3月2日。

④ [意]安德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页。

⑤ 前文中埃塞卜西的儿子。

⑥ “Tunisia’s Nidaa Tounes Loses Parliamentary Majority to Ennahda,” *Daily Mail*, January 26, 2016, <http://www.dailymail.co.uk/wires/afp/article-3418086/Tunisia-Nidaa-Tounes-loses-parliamentary-majority-Ennahda.html>, 登录时间:2018年8月20日。

要原因是埃塞卜西总统个人魅力发挥的作用。复兴运动前秘书长贾巴里因不满党的政策,也退出了该党。

第三,突尼斯的政党制度保留了大量传统政治的内容。突尼斯在进行民主转型的同时,仍然保留了一些传统政治的内容。首先,突尼斯的政党区分度不高,政党更多以领导人为其主要标志。如复兴运动和人民请愿党(*Al-Aridha*)同属现代伊斯兰政党,而组成突尼斯联盟的各世俗政党的政纲也并无根本区别。相反,拉希德·加努希、埃塞卜西、穆斯塔法·本·贾法尔、哈马等人则代表了不同政党,其政治诉求存在显著差异。突尼斯政党政治中的宗派色彩仍然较重,显然不利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其次,政党内部的民主化程度不高,庇护主义、裙带主义、老人政治等传统的政治积习仍广泛存在。伊斯兰主义者接受了复兴运动的领导,在复兴运动执政时期,突尼斯 22 个省中有 18 个省的省长由复兴运动或与其关系密切的独立派人士担任。原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的成员则被突尼斯呼声党所笼络,并采用政商联合的新模式。拉希德·加努希任命自己的女儿、女婿从事政治活动,^①他的女儿被任命为复兴运动的新闻发言人,女婿被任命为突尼斯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但其女婿的能力在党内显然不具有竞争力。而埃塞卜西儿子的崛起导致政党内部产生分裂。^②拉希德·加努希连续当选复兴运动党主席,年届 90 的埃塞卜西仍在把持突尼斯呼声党的政治活动。在主要政党中,复兴运动是党内民主最健全的政党,但也没有实现代际更替;穆斯塔法·本·贾法尔组织了党内的决策圈;进步民主党被认为仅仅以哈马个人权力为依归;由富豪哈什米·哈姆迪建立的人民请愿党则完全通过金钱政治进行政治参与。

第四,伊斯兰政党的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因素。突尼斯复兴运动被视作民主转型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作为突尼斯政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复兴运动并没有完全公布其政治纲领。相反,有批评人士指出,复兴运动在政治上的妥协行为旨在掩盖其真实目的;复兴运动虽然渴望在突尼斯重建伊斯兰社会,但并没有采取埃及穆兄会的做法,而是采用务实策略参与突尼斯的政党政治。复兴运动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曾经告诫萨拉菲派人士要有耐心,并在其他场合也强调过这种策略。有学者认为,复兴运动虽然早已在政党名称中剔除了“伊斯兰”的字样,但其宗教政党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从本质上看,复兴运动与穆斯林兄弟会属于同一类政党,它们都以实现其纲领中的宗教诉求作为政党目标。因此,有学者指出,在权

^① James Brandon and Raffaello Pantucci, "UK Islamists and the Arab Uprisings,"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Vol. 13, 2012, p. 26.

^② Youssef Cherif, "The Leadership Crisis of Nidaa Toun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December 8, 2015,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sada/?fa=62216>, 登录时间:2018年3月2日。

力的诱惑下,复兴运动将不遗余力地追求伊斯兰化的目标。^①这无疑将对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发展和民主转型产生不利影响。突尼斯自独立以来已经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伊斯兰化的道路将会使突尼斯政治和社会陷入分裂,制约突尼斯的民主转型。

因此,当前突尼斯的政党制度尚无法完全发挥政治稳定的作用。突尼斯之所以能够避免政治动荡,比较顺利地向民主政治转型,与突尼斯文化中的“渐进主义”^②传统存在密切关系。马尔祖基和埃塞卜西等突尼斯政坛常青树都在极力推动政治和解。埃塞卜西建立的突尼斯呼声党中有大量宪政民主联盟的成员。2017年10月,在总统埃塞卜西的力主之下,突尼斯议会终于通过了“行政和解法”^③,这使得旧政权中的政治精英可以继续从政,同时激发了私营企业主的投资热情。但围绕这一法案的激烈争论,也使得突尼斯政治出现了新的裂痕。突尼斯要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就必须解决当前存在的政党政治难题。

四、结 语

2011年以来,突尼斯的政党政治实现了长足发展,逐步建立起了现代政党制度。政党之间的有序竞争保证了突尼斯民主转型的平稳进行,使其成为“阿拉伯之春”后唯一的成功案例。突尼斯民主转型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的政党制度为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渠道,建立起了民众自由表达自身诉求的机制;其二,新的政党制度为处于对立的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了正面交锋的合法机制,使得突尼斯避免陷入长期冲突甚至爆发内战的危险。但是,传统政治习俗等因素也阻碍着突尼斯的民主转型,突尼斯的民主转型仍任重道远。突尼斯的政党制度仍具有脆弱性,它既不能被精英阶层完全认同,也无法代表绝大多数的青年和边缘群体。突尼斯已较为成功地建构出“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民主样板,但如果缺乏了民主转型的动力,突尼斯仍有可能倒退至威权政治时代。

(责任编辑:赵 军)

^① Shadi Hamid, *Temptations of Power: Islamists and Illiberal Democracy in a New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95.

^② 突尼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由于和法国殖民者相比实力悬殊,因而采取了不断施压,分阶段解决问题的渐进主义路线。突尼斯独立之后,渐进主义成为其独特的经验和传统。参见王天瑞:《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载《阿拉伯世界》1985年第1期,第90页。

^③ Lamine Ghanmi, “Tunisia’s Amnesty Law Hopes to Reassure Civil Service,” *The Arab Weekly*, October 29, 2017, p. 10.